

臺灣口譯產業專業化： Tseng¹ 模型之檢討與修正

汝明麗

Joseph Tseng (1992) 依據社會學對職業／專業的研究提出口譯專業化模型，從第一階段的市場紊亂 (market disorder) 到最後第四階段專業自主，其中每個階段均有其指標性的發展結果。教育部於 2007 年底與 2008 年初舉辦第一屆中英翻譯能力檢定考試，其中口譯考試部分僅就應試者之短逐步口譯及長逐步口譯能力進行測試，儘管如此，此一認證考試的舉辦業已引發各界對口譯及其培訓工作的好奇與興趣。其實在此考試之前，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早於 2004 年起就舉辦一年一度的口譯聯合專業考試，而且將該考試通過與否和學生畢業、取得碩士學位逐漸脫鉤，亦即將此聯合專業考試的定位提升至兩所主辦的專業認證考試。本文將檢視臺灣口筆譯產業第三與第四階段專業化指標之進度，其中包括就口筆譯培訓機構主辦之專業認證考試與政府主導的翻譯能力考試做初步比較，分析兩紙證書所代表之意涵，以及此等考試對臺灣口譯產業專業化發展的影響。最後並依據過去十多年來臺灣口譯產業實際發展現況，對 Tseng 的社會學專業化模型提出若干修正建議。

關鍵詞：會議口譯、專業化、專業考試、認證考試

收件：2008 年 12 月 29 日；修改：2009 年 4 月 28 日；接受：2009 年 6 月 12 日

汝明麗，天主教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elma.ju@gmail.com。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aiwan: A Critical Review of Tseng's Model

Elma Mingli Ju

According to Joseph Tseng's 1992 model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 in reference to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in Taiwan, there are four phases, beginning with market disorder and ending with professional autonomy, which is often realized through licensure.

In fact, since 2004,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GIT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GIT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ave begun to organize an annual joint professional diploma examination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Over the years, both Institutes have gradually moved to delink their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joint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and their graduation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other words, the joint professional diploma examination is now positioned as an independent accreditation test organized by two of Taiwan's most prestigious institutes in the field of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t the end of 2007 and the beginning of 200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eld the first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Examination. The examin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both short and long, has aroused much debate about and interest in th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e said joint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and the MOE examin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ccreditation tests, which, according to Tseng's model,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sector. This paper therefore attempts to review the progress that Taiwan'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ector has made toward professionalizati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Efforts are also made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two examinations in term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diplomas/certificat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aiwan. Finally, based on the aforesaid review, the author proposes a few changes to Tseng's sociological model.

Keyword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accreditation

Received: December 29, 2008; Revised: April 28, 2009; Accepted: June 12, 2009

壹、前言

為求在實務工作與教學訓練上的精進，許多口譯研究者把研究重心放在口譯的過程及結果上。在口譯過程部分，不論是 Seleskovitch 的傳意理論，或是從認知心理學、神經語言學角度研究口譯員口譯時的認知負荷、大腦運作情況，抑或注意力的分配，乃至口譯結果——品質的評量、來源語跟目標語的比對、對口譯產出所做的言談分析，基本上均為微觀研究 (Pochhacker, 2004, p.108)。這類研究對口譯實務與訓練品質、效率的提升確有貢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宏觀研究，也許是就口譯在特定社會建制中的運作與角色、口譯在人類歷史上的演進歷程、或是社會—專業化模型，同樣值得口譯研究者的投入與重視。兩種類型的研究應相輔相成，以為建構口譯專業的完整面貌。本文即擬以 Tseng (1992) 提出之臺灣口譯專業化模型為基礎，對照過去近 20 年來臺灣口譯的發展，檢視其專業化進程，並對 Tseng 模型提出若干修正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專業化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各個職業與階層的分工均愈趨精細，由此型塑許多社會組織的特徵，對個體生活亦產生重大影響，專業化的現象也因而成為社會學家觀察的主體 (Greenwood, 1962；引自洪瑞恬，2004，頁 31)。社會學家對這個現象展開研究，從 20 世紀中葉強調描述成功專業化的職業究竟具備哪些特徵 (traits)，到 1963 年 Everett C. Hughes 提出質疑，認為社會學家應該把研究焦點放在哪些特定情境會造成某職業的從業者企圖提升其地位，成為社會所認定之專業人士。Freidson (1970；引自 Macdonald, 1995, p. 8) 亦提出個人與團體所採取的行動及彼此間的互

動才是職業專業化研究的重點所在，因為所謂職業的特性並非固定不變，且一個職業要提升到專業地位，前提為其中的成員積極建立該行業所屬的意識型態，爭取自主權。到了 1977 年 Larson 出版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以 Weber 所提社會壁壘（social closure）概念——亦即社會利益團體會設法阻絕外來者分享該團體所享有之經濟、社會資源——為基礎，進一步提出個別成員之企圖心加上集體行動，形成向上的集體流動性（upward collective social mobility），而這正是職業專業化的最大動力。也因為在建立社會壁壘、提升本身職業地位的過程中牽涉到與社會其他成員之衝突、角力，一般稱如 Freidson、Larson 等社會學家提出的職業專業化理論為權力或控制理論（the power approach），以有別於之前強調描述已成熟專業的結構、特徵之特徵理論（the theory of trait）²。

過去的專業化研究多集中在醫學、法律等職業，在專業化論述重點由特點描述轉變為以過程（及其動態變化）為導向後，很快就被不同領域的學者應用在更多其他職業的研究上，例如會計，Birkett 和 Evans（2005）便以上述概念出發，企圖建構一專業化模型來理解、檢視會計師職業公會推動會計專業化的歷史，其中強調專業權力、專業協會掌握的控制力量、採取之步驟，如何與市場、政府等其他社會建制相互依存。

Tseng（1992）則以前述社會學對專業化研究的觀點，率先提出會議口譯專業化模型，並以其為基礎討論臺灣的會議口譯發展進程。Mikkelsen（1996）套用 Tseng 專業化模型來檢視美國社區口譯的專業化程度，指出在美國除了法庭口譯以外，其餘類型的社區口譯多陷於 Tseng 模型第一階段所描述的市場紊亂之中，各界對社區口譯員的專業性亦認識不足。Ozolins（2000）則就對話口譯（liaison interpreting）在不同國家的服務提供模式做比較研究，首先就法源基礎之有無區分此等口譯服務的提供模式外——從付之闕如到專案式服務、綜合語言服務，其次指出要達到完整服務供給（comprehensiveness），必須具備有組織的語言服務、訓練及認證等三大要素。而在這些完整的服務提供體系中，通常又可以發現六點

次要特徵，包括從業人員的專業進修、訓練／教育服務使用者、相關政策的規劃、對不同語言的兼容並蓄、公私部門共同提供口譯服務、發展口譯專業化。

此外，2004年於瑞典舉辦的第四屆法律、醫療與社會服務口譯國際研討會也以社區口譯專業化為主題，廣邀學者針對不同情境內的社區口譯進行微觀及宏觀研究，並就專業意識型態的建立、從培訓角度探討專業技能的提升與評量（Wadensjo, Dimitrova, & Nilsson, 2007）。

二、Tseng 臺灣口譯專業化研究：一個社會學模型

Tseng 從社會學出發所建立的口譯專業化模型雖以控制理論派社會學家的論點為基礎，但進一步強調其中各個環節之間的動態關係。以下簡介該模型中所提出四個發展階段（見圖 1）。

在第一個階段，整個市場極為紊亂，從業者之間競爭激烈，而市場需求提升的同時，培訓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培訓機構在此一階段的影響，根據 Tseng 指出，有好有壞。負面而言，因應市場需求倉卒設立的培訓機構實際訓練出來的人才很可能水準參差不齊，甚至造成過度供給，使市場更加混亂。但另一方面，少數較具遠見的培訓機構仍能堅持高品質的訓練，加上實務工作者中的有識之士也有心改善市場混亂情形，各方遂能逐步建立共識，以促進產業專業化為共同目標。

因此到了第二個階段，在堅持品質的培訓機構培育出優質人才進入市場，並逐漸累積到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後，供給面的品質出現顯著提升。而需求面的客戶也發現受過適當培訓與未受過培訓者所提供的服務品質確有差異，於是各方看法與意見漸漸整合，除了對專業要求產生共識之外，市場上的從業人員之間也增強對本身職業的認同，更願意致力於其專業化的推動。

根據 Larson（1977）及 Hodson 與 Sullivan（1990），當某個職業團體企圖提升其專業地位時，必須仰賴專業協會整合、動員該職業從業人員

的集體努力。據此，Tseng 認為在各界共識建立後，下一步即可能成立一專業協會，而專業化發展的第三階段即以專業協會運作為其核心，這同時也是評估口譯專業化最重要的考量因素（Tseng, 1992, p. 75）。專業協會的成立主要是為了達成對業界內、外的掌控。對內而言，強而有力的專業協會企圖控制專業知識的界定與訓練，控制市場進入，同時制定職業倫理守則來規範其成員；對業界以外之掌控，指的則是透過界定客戶需求、規定標準化工作條件及與客戶的直接接觸，專業協會可以對市場發揮相當的影響力（Tseng, 1992, p. 21）。

加強對市場控制的方法之一，乃是透過宣導、公關、行銷等手段來加深客戶與一般大眾對某一職業的認知。一旦客戶與大眾肯定該職業的專業性，專業協會更可訴諸政治力量，說服政治機關、立法機構此等專業服務的品質良莠攸關公眾利益，故應以認證方式來確保從業者的服務品質。因此認證考試代表了國家對一個職業的重要性與專業地位的肯定，而專業協會於第三階段建立起對業界內、外的掌控，此時便理所當然主導認證考試，除進一步提升市場進入障礙外，也從而獲得專業實務上的自主權。這就是專業化模型中的第四階段（Tseng, 1992, p.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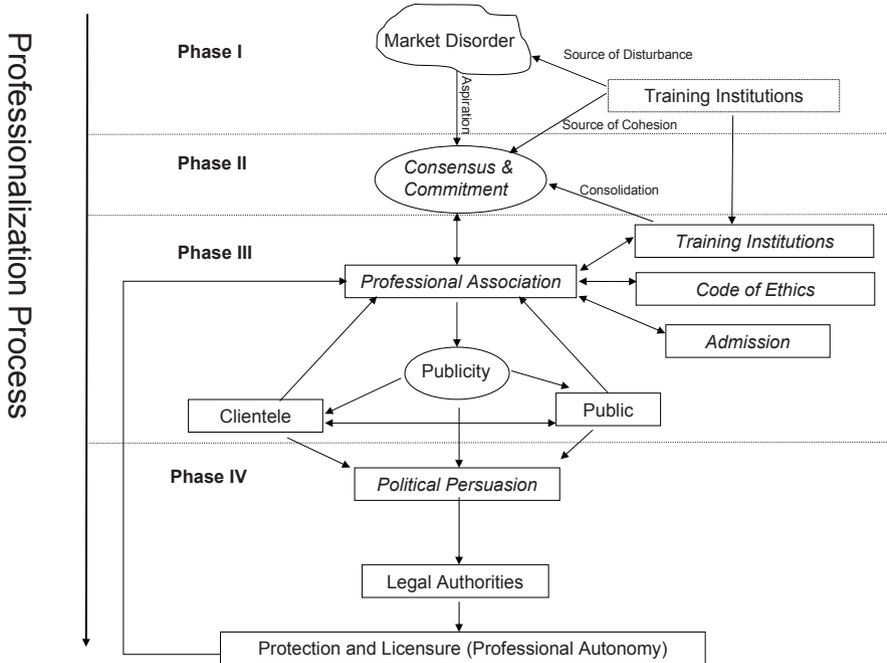


圖 1 Tseng 專業化社會學模型

資料來源：Tseng (1992, p. 43)。

根據此模型，專業化的兩大指標即為專業協會的建立與藉由認證考試獲得法律對特定職業（專業自主權）的保障（Tseng, 1992, p. 88）。在 1992 年 Tseng 撰文之際，臺灣尚未出現口筆譯專業協會，遑論口筆譯認證考試，亦即 Tseng 所謂的「前協會時期」（pre-association period），因此當時提出此一模型時，Tseng 亦不諱言以該模型為基礎提出的各項論述其實有待現實或實證研究的驗證（Tseng, 1992, p. 55）。

「前協會時期」延續到 1994 年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發起翻譯學研究會後方告終結，因此第一個指標已經達成。在認證考試部分，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與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自 2004 年兩所聯合舉辦專業考試，並頒發給通過考試者聯合口譯證書，加上教育部於 2007 年底、2008

年初首度舉辦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亦即官方舉辦之能力認證考試，因此在前述專業化兩大指標俱備之際，檢視 Tseng 所提模型與臺灣口譯專業化進程之契合度，可謂此其時也。³ 然而 Tseng 模型與實際狀況並非全然吻合，因此以下即就臺灣口譯界出現這兩大專業化指標後的發展與 Tseng 模型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的論述相互對照。

參、臺灣口譯實際發展與兩大專業化指標

一、專業協會之建立

1992 年臺灣仍處於專業化的第二階段，亦即由培訓機構與業界人士一齊積累對口譯專業的共識與凝聚力。直到 1994 年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發起翻譯學研究會後，臺灣才出現第一個口筆譯專業協會。翻譯學研究會後來在 1997 及 1999 年兩度更名，最後才正名為臺灣翻譯學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廖柏森，2007，頁 190)。不論名稱為何，學會組織的建立似乎標誌著臺灣口譯專業化堂堂邁入第三階段。⁴

可是如果仔細比較 Tseng 於論文中所定義的專業協會的角色與功能，即可發現臺灣翻譯學學會的定位與之不盡相同。

Tseng 以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 為例，專業協會對內而言，除定義專業譯者的工作內容、建立職業守則 (code of ethics)、監督從業人員的行為、保護客戶權益、控制市場進入之外，對外則代表從業人員與主管機關、客戶協商、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報酬，甚至推動官方認證以提供從業人員所需之保障 (Tseng, 1992, p. 72)。

實際瀏覽 AIIC 網站 (<http://www.aiic.net/ViewPage.cfm/article8>)，則可發現該協會除提供會議口譯培訓機構關於口譯培訓的建言，制定會員

應遵守之專業作業守則，並舉辦研討會協助口譯員精進專業能力、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口譯研究計畫，對外則代表會員與需要口譯服務的國際組織協商工作條件，教育口譯服務的使用者等。

此外，若以美國譯者協會（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TA, <http://www.atanet.org/aboutus/index.php>）為例，同樣也可以看到該協會提供會員進修、建立聯繫網絡的機會；舉辦研討會聚焦業界關心的議題；提供客戶教育、為譯者爭取合理工作條件，甚至舉辦認證測驗，從 1973 年至今，其認證測驗的語言組合已經多達 24 種。針對通過認證者，ATA 進一步要求需持續進修，並誓言遵守該協會所訂定之專業倫理規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2005）。

而臺灣翻譯學學會的主要活動，根據其所屬網站資料顯示（http://tati.org.tw/?page_id=2），集中在推動口筆譯研究，包括舉辦小型論文研討或專題座談，以及發行論文集《翻譯學研究集刊》。此外，提供與口筆譯實務、研究相關最新資訊亦為該學會的工作重點。

由此觀之，臺灣翻譯學學會目前的定位較近似為專業平臺，提供口筆譯界實務工作者或研究人員一個分享心得、汲取新知的管道。這與前述專業協會積極為會員訂定內部職業規範、控制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向外代表會員發聲、爭取會員權益的定位顯然有極大出入。兩者的相同點在於凝聚業界共識、鼓勵研究風氣、與培訓機構維持密切互動，期使口筆譯的專業化不僅只靠口筆譯員實務經驗的積累，更要朝質、量兼具的科學化研究方向邁進。

因此，目前臺灣確實已成立專業翻譯協會，但其功能與權力實不若其他專業協會完備。根據 Tseng 的專業化模型，臺灣翻譯學學會目前發揮之功能包括凝聚共識與承諾、與培訓機構互動、提供大眾有關口筆譯問題的諮詢，以及透過演講、研討會的舉辦，讓外界更加認識口筆譯專業。但是從控制／權力的角度觀之，臺灣尚未出現足以對口譯客戶、口譯員工作條件、市場進入等發揮影響力，甚至強勢主導的專業協會。

二、認證考試

在既有專業協會的影響力仍嫌不足的情況下，要進展到第四階段向政界遊說、進而促成立法機構採取行動來對口譯專業進行認證、提供保障，自然是力有未逮。⁵也因此以下所要討論的兩種型態之「認證考試」，其發起背景與專業協會之運作並沒有直接關聯。

雖然沒有專業協會的參與，但輔大—師大兩校聯合專業考試因為嚴格的考試標準以及與市場進入的直接關聯，雖然應考者資格有所限制，但其認證意涵仍值得探討與重視。而教育部翻譯能力考試是政府首次參與翻譯人才評鑑，其獲得媒體關注的程度與證書後續可能產生的效益，對口譯專業化歷程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一）背景

以時間而言，輔大—師大兩校聯合專業考於 2004 年首次舉辦。之前皆為兩所各自舉辦專業考，定位為同學的結業考，在內規上嚴格限定通過專業考為畢業要件之一。爾後由於兩所在實務培訓上的教學理念、方法近似，甚至兼任師資有所重疊的情況下，雙方開始研商聯合舉辦專業考的可行性。

兩所自 2003 年開始協商，主要原因除前述整合資源、避免重複做相同的事情（duplication of efforts）之外，政府政策是另一個間接促成因素。臺灣政府於 2002 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其中在「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行動方案」之下，指定由教育部主辦、國立編譯館承辦翻譯專業人才評鑑標準及檢定制度。國立編譯館並委託專家、學者展開相關之研究計畫，包括第一期研究「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之研究」，研究期程是 2003 年 1 月至 10 月；第二期「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研究期程為 2004 年 5 月到 2005 年 10 月；第三期研究「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第三期研究計畫」，研究期程為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

由政策宣示及相關研究規劃看來，臺灣極可能在近年內推動翻譯人才評鑑，或曰翻譯能力認證制度，於是兩所在協商後決議，在政府確定實施該制度之前，做為臺灣歷史最久、培育專業口譯人才經驗最豐富的兩個研究所應該率先攜手合作，將原本結業考試定位的專業考提升到認證考試的層級，亦即在聯合舉辦的架構下，以最高專業標準來設計考試方法、考題篩選，以及評分機制。就某一程度而言，此舉主要是希望能根據兩所多年來培訓、評量口譯學生的經驗，從零開始建立一個認證的範例措施，供作日後主管機關要舉辦認證考試時可以參考、甚至仿效的對象。⁶

此乃兩校聯合專業考當初發起的背景。而教育部於 2007 年底舉辦的翻譯能力考試則如前所述，係政府建設發展計畫中為達成提升新世代競爭力、打造英語生活環境目標下的一個任務與手段。惟在欠缺法源依據的情況下，教育部翻譯考試定位其實是能力檢定而非執照 (license)。因此儘管一為培訓機構之間聯合舉辦的專業考試，一為政府機關主辦的翻譯能力考試，但基本上兩者均可視為能力認證考試。⁷

(二) 證書意涵

儘管聯合專業考試與教育部翻譯能力考試因缺少法源之故，其結果並無法提供應試者所謂法律保障 (legal protection)，但若視之為能力認證考試，則其所頒發證書的意義與影響就值得做進一步的討論。

聯合專業考試證書的取得，除了代表專業考試的評審委員肯定應試者的專業資格，願意與之搭配合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代表臺灣兩個歷史最久、聲譽最著的翻譯研究所願意為通過者背書。除了在網站上公布通過者名單外，兩所更積極與專業會議公司、口譯聘僱單位聯繫，以推薦這些口譯界的新人。若接獲口譯案件，兩所也會優先推薦這些新人或安排與資深口譯員搭配合作。除了所辦與教師優先引薦外，兩所畢業校友在業界形成的龐大人脈網絡，也成為提攜學弟妹進入口譯市場的最佳渠道。

2007 與 2008 年教育部翻譯能力逐步口譯考試的通過率皆低於 10%，⁸ 引起各界廣泛討論，而媒體的討論與報導點出過去大家對翻譯的迷思——以為只要懂得中英兩種語言自然就可勝任筆譯、口譯工作，並以這次翻譯能力考試的結果為例，說明儘管報考者眾，但實際能做到「以通順、合乎語言規範之譯語，準確且完整地傳達源語訊息」者卻屈指可數，可見翻譯並不像大家想像的那麼容易。⁹

此類報導對於扭轉大眾對翻譯工作的誤解，確實跨出了良好的第一步，只是對於獲頒考試及格證書者而言，具體效益還有待觀察。這點與翻譯能力考試目前僅舉辦過兩屆，通過人數不多有關，儘管在教育部網站上已成立通過考試之人才資料庫，但僅列出通過者姓名，並無其他聯繫方式或由教育部主導之人才媒合、就業輔導計畫。換言之，翻譯能力證書是否能夠成為通過者進入口譯市場的敲門磚，或像全民英檢一樣成為求職時的加分項目，可能尚需數年的累積與持續的研究，方能找到答案。

兩相比較之下，不難發現，由學術培訓機構所頒發之專業考試證書，因為有其於業界深耕多年的人脈網絡為後盾，讓通過考試、持有證書者在兩所背書的情況下，能夠較迅速地結識前輩、進入市場，逐步累積個人的專業口譯資歷。而教育部翻譯能力考試則一方面因為只考逐步口譯，與目前會議口譯市場同步口譯占多數的趨勢有所出入，加上推出時間甚短，因此所頒發的考試合格證書還無法累積足夠的數量與能量，對口譯實務界產生較明顯的影響。¹⁰

目前臺灣口譯市場雖無明文之進入障礙或門檻，但由於兩所歷年來在業界打下良好口碑，加上畢業生在市場已占有一席之地，多有機會引薦後進學弟妹，對非兩所畢業生而言，難免形成一實質的進入障礙。因此就引薦進入市場之功能性來說，通過兩所聯合專業考應該較教育部翻譯考試更有效。

再者，目前臺師大翻譯研究所仍將通過專業考試列為畢業之必要條件，因此除非該所剔除此一規定，或是停止與輔大翻譯學研究所合辦考

試，否則專業考勢將繼續辦理下去。

然不可否認的是，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考試在舉辦兩年之後，仍享有相當的媒體曝光率，而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上亦可於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特區中看到歷年通過考試名單，此等宣傳效果長期累積下來亦不可小覷。兩校聯合專業考試畢竟僅限輔大與臺師大的翻譯研究所學生可以報考，歷屆考生每次最多不超過 14 人，通過者人數更少。未來兩種考試對口譯市場的影響如何，是否能夠確實促進臺灣口譯產業的專業化，讓口譯員享有更大的專業自主權，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肆、臺灣口譯專業化歷程模型之修正

由上述觀之，臺灣口譯的發展已經具備第三與第四階段等多項要素，但這些要素的功能與作用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儘管在形式上似乎已經可以自第三階段邁入第四階段，但因為各項要素實質上仍欠完備，所以或可稱之為一個準專業化的發展階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專業協會並未如 Tseng 模型中所描述的發揮多項促進專業化的功能，例如制定職業倫理守則、控制市場進入或代表口譯員與客戶協商工作條件等，幾乎都付之闕如，因此在圖 2 修正模型中將這幾部分的箭頭改以虛線表示。另一方面，中介機構、培訓機構反而承擔起專業協會所應擔負的職責。以下即分別討論中介機構與培訓機構在準專業化階段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兩種認證考試並存的情形對第四階段專業化歷程有何意義。

一、中介機構：專業會議公司

綜觀過去近 20 年來臺灣口譯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隨著市場日益成熟，客戶與一般大眾對口譯的認知逐漸增加，形成推動口譯邁向第四階段專業化的助力。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Tseng 於 1992 年提出此模型時，

臺灣還沒有足夠規模的專業會議公司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r, PCO)，因此 Tseng 模型中第三階段專業化的主要推手係專業協會。¹¹ 然而自 Tseng 論文完成後的十多年來，臺灣的專業會議公司數目及規模都有所成長，於是除了提供會議視聽器材與設備外，越來越多開發市場、教育客戶、為口譯員爭取合理條件與環境等工作也逐漸由會議公司或經紀人來接手。¹²

因此，專業會議公司已成為專業分工中極為重要的作用者 (actor)。Ozolins (2007, p. 121) 更稱口譯中介機構 (interpreting agencies) 為「口譯員的第三個客戶」，亦即口譯員除了服務演講者與聽眾之外，應視此等中介機構為其另一個重要客戶，不可輕慢待之。而對需要口譯服務的客戶而言，會議公司提供單一窗口、一次購足的服務，例如口譯人才資料庫，就讓客戶能夠挑選符合其會議口譯需求的譯者，而非盲目地在市場上聯繫個別口譯員、不斷詢價、比價等。

藉由商業組織高效率的運作，會議公司也可以是培訓機構與市場 (客戶) 之間的介面，讓翻譯培訓機構無需費心為畢業生在市場上謀求出路，或挺身而出扮演仲介者的角色，因此能夠全心投入口譯人才的培育工作，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會議公司對口譯市場的進入 (admission) 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在圖 2 的 Tseng 模型修正圖中應於第三階段加入 PCO，並以實線箭頭連結到市場進入、客戶與公眾宣導。

值得注意的是，Tseng (1992, p. 21) 在描述專業控制時，特別提到專業人士必須能夠與客戶直接接觸方能控制、影響市場。因此究竟專業會議公司對於會議口譯員爭取自主權是一橫阻於口譯員與需要口譯服務客戶之間的絆腳石，抑或是助力——媒合口譯員與需要口譯服務客戶，擔任兩者間的溝通橋樑，並提供良好工作環境／服務品質，或許端視口譯員如何看待這些中介機構，以及兩者之間如何互動。

但不論口譯員是否認同專業會議公司實為自己所服務的第三位客戶，從權力／掌控的觀點來看此階段專業化歷程，專業會議公司確實扮演重

要角色，理應納入第三階段模型，並標記其對於客戶、一般大眾對口譯專業的認知，以及市場進入等面向所發揮的影響力。

二、培訓機構學術化

另一方面，專業翻譯培訓機構通常必須建立在高等教育層級，方能培養出優秀人才，奠定專業化的基礎（Tseng, 1992, p. 46）。事實上，從教育部近年來對各大專校院系所評鑑的標準，亦可看出在高教體系內，任何系所都必須兼顧教學與研究，不得有所偏廢。因此高教體系內的翻譯培訓機構——翻譯研究所與翻譯系——不可能長期以人才培育為其創立的唯一目標。Gile（2008）也指出大學內的翻譯訓練機構必須有所轉型，往學術化（academization）的方向走。換言之，唯有透過學術化，研究成果的不斷累積，培訓機構才能夠把口譯的形式與內涵說清楚、講明白，口譯教學才能夠走上系統化、科學化的道路，而非一貫以師徒相傳、經驗分享為基礎。

因此，當專業化進程跨入第四階段時，培訓機構並非就此隱身幕後，而是從第三階段以培育優秀專業譯員為主，轉型成為培育人才的同時亦致力追求學術化發展。故於此專業化歷程模型中，應該特別強調大學內口譯培訓機構於第四階段的重點在於提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實力。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Tseng 模型中做為口譯專業化主要推手的專業協會，在臺灣似乎還未發揮其功能，可能原因包括臺灣翻譯學學會並非由會議口譯員及業界人士發起之組織，反而因其係由翻譯學研究所發起，該學會之目的與功能實更貼近前述培訓機構所追求的學術化。也因此第四階段專業化歷程中，Tseng 預期會由專業協會扮演的角色，例如推動專業認證制度、建立認證標準等，其實部分已由口譯培訓學校取而代之。¹³

三、認證考試

口譯市場的擴大、培訓機構的學術化，加上政府政策的推助，終於促成了翻譯人才評鑑從紙上研究計畫，進一步落實到翻譯能力考試。雖然未見專業協會與使用口譯服務的客戶或一般大眾向政界遊說，但該考試的舉辦應可詮釋為就政策而言，政府已肯定翻譯人才評鑑的重要性，只是立法機關尚未有具體回應。也由於欠缺法源，該能力考試的定位應為能力檢定。而輔大與臺師大翻譯研究所的聯合專業考試對兩所及考生而言，則為一專業證書考試，且因其為兩所對外界舉薦口譯人才的基礎，對會議口譯市場進入有一定的影響，在此階段或許可以將兩種考試同樣視為認證考試，並將其位階置於政治遊說（political persuasion）與立法機構（legal authorities）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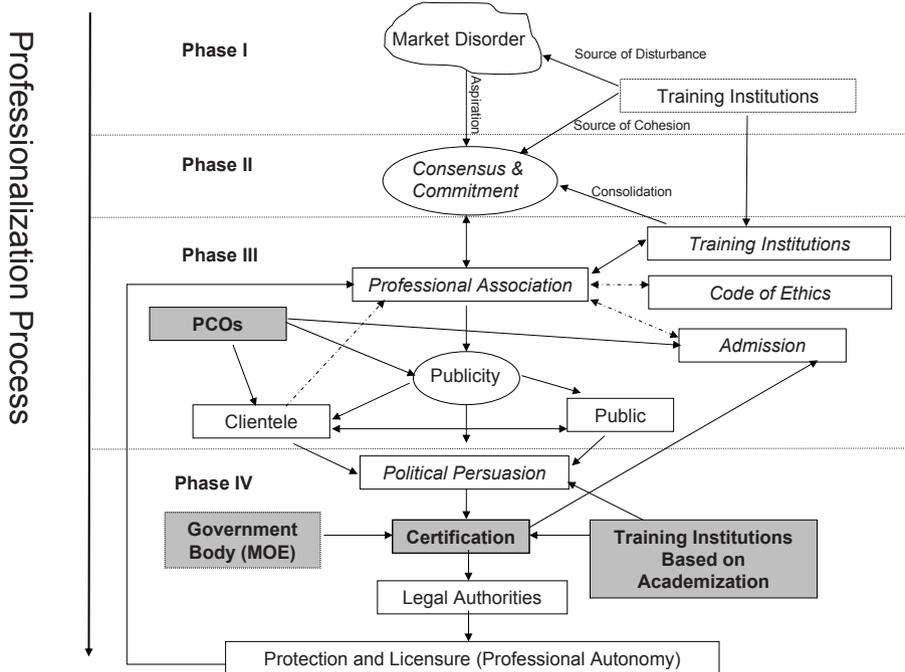


圖 2 Tseng 模型修正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 Tseng 模型提出之修正。

伍、結語

本文從 Tseng 於 1992 年提出的專業化模型出發，檢視過去 17 年來臺灣口譯專業化歷程。結果發現臺灣的口譯在形式上已經邁入第三與第四階段，惟在許多方面各項條件尚欠完備，例如第三階段的專業協會，雖然在提升臺灣各界對翻譯的認識與推廣翻譯研究上有卓著貢獻，但是在代表口譯員爭取權益、制定職業規範、控制市場進入上，則因本身定位之故，不見足夠的意願與能力。

另一方面，專業會議公司在數量與規模擴大之後，逐漸成為培訓機構與市場之間的橋梁，一方面引介培訓機構的畢業生進入市場，一方面也讓口譯服務成為會議籌辦服務的一環，間接擴大口譯產業的規模，對口譯的專業化做出貢獻。但其對於口譯員爭取專業自主權究竟是助力或阻力，仍有待進一步觀察與研究。

在第四階段，儘管臺灣已經有培訓機構舉辦的專業證書考試（兩所聯合專業考試證書）以及教育部舉辦之中英翻譯能力考試，但由於欠缺法源，尚無法與確立專業自主性的執照考試畫上等號。

儘管如此，培訓機構在第四階段仍扮演吃重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扮演 Tseng 模型中的專業協會所應承擔的角色，例如針對官方舉辦之認證考試提供研究、命題、審閱等諮詢，同時還有許多口譯教師亦實際參與審閱評分工作。¹⁴ 但同時從這些具體工作內容亦可看出培訓機構的轉型，從之前幾個階段以培養優秀譯員為優先要務，到第四階段亦必須投入研究，以確立口譯學術化，進而提升其專業內涵與形象。

此外，如本文所述，若培訓機構在確定彼此教學方法及理念、課程規劃與設計近似的前提下，舉辦聯合專業考試，並將該專業證書的取得與碩士學位文憑加以區隔，且列為所方向外舉才時的依據，則此等實質的（de facto）認證考試由於其與官方舉辦之認證考試仍有所區隔，此時應將其視為 Tseng 所述專業化進程之干擾，抑或解讀為培訓機構對高品質、高

水準的專業堅持，或許仍有待時間的驗證。

總結而言，臺灣的口譯發展已經進入準專業化的階段，Tseng 模型從社會學角度提出專業化進程應該／可能歷經的各個環節，以之檢視今日臺灣口譯專業化程度，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任何一個職業的專業化都需要相當的時日，臺灣首見會議同步口譯係 1983 年 11 月在臺北舉辦的國際青商會第 38 屆年會。而第一個專業會議口譯的培訓機構——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更是遲至 1988 年才正式成立。因此，臺灣的口譯產業能夠在短短 20 多年內達到 Tseng 模型的兩大專業化指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成就，接下來如何從準專業化進一步邁向法律保障與專業自主，將是所有口譯工作者、培訓機構與相關組織需要一同克服的挑戰。

註釋

1. Joseph Tseng (曾文中) 係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生，於 1992 年撰寫之碩士論文 *Interpreting as an emerging profession in Taiwan - a sociological model* (臺灣口譯專業化的研究——一個社會學的模式) 中率先提出會議口譯專業化發展歷程模型。Tseng 目前為臺灣會議口譯市場上之活躍口譯員，同時亦於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及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兼課任教。
2. Collins 在 1975 年曾提出假設：較團結一致的職業團體能夠爭取到較多政治資源，因而得以壟斷、控制其專業實務 (引自 Cullen, 1985, pp. 352-353)。Parry 與 Parry 也於 1976 年提出類似概念來討論醫學專業之崛起 (引自 Child & Fulk, 1982, p. 158)。
3. Tseng 模型中並未針對認證提出仔細定義或說明，在模型中選擇的用字為 licensure，在正文討論時則是 licensure 與 accreditation 交互使用 (Tseng, 1992, p. 52, p. 62, pp. 82-84, p. 88)，因此本文一律譯為範圍較廣之「認證考試」。有關執照考試、能力檢定考試定義上的差別，行政院新聞局 2004 年公布的《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將證照制度歸納為三大類：(1) 技能檢定，(2) 證書，(3) 執照。技能檢定係評定是否達到最低標準，而證書則係確認是否具備職業專業知能，而第三個執照則為從事特定商業活動不可或缺的條件。臺灣並無法律限定須具備執照方能從事口譯工作，故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考試自然不屬於執照考試，就名稱而言應屬於能力檢定。至於兩所聯合專業考試，根據其專業考試辦法，其定位屬於專業證書考試。
4. 除臺灣翻譯學學會之外，臺灣亦有自 1989 年成立迄今的臺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 (Translation and Attestation Association of Taipei)，惟其性質為產業公會，主要定位係代表翻譯產業與公部門進行聯繫與溝通，與真正由口譯員組成之口譯專業組織仍有

相當差距，故在此不列入討論。

5. 前立法委員蕭美琴曾於 2006 年 3 月 14 日舉辦「建立我國翻譯師制度公聽會」，席間邀集政府代表與學界及民間代表討論如何建立完善的翻譯師制度以確保政府公務品質與臺灣於國際間的形象。惟會後除立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事錄中提及蕭委員質詢行政院時提出行政院應儘速指定翻譯師之主管機關，以加速翻譯師法草案之研擬，後續未見相關單位採取任何具體行動。
6. 本文所述兩所聯合專業考試舉辦之緣起，係以筆者自 2003 年下半年起參與兩所多次協商過程的經驗為基礎。
7. 參見註釋 3。
8. 根據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公布數據，2007 年短逐步口譯考試通過率為 9.59%，而長逐步考試的通過率則為 6.57%；2008 年的口譯考試通過率則為 6%。2009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edu.tw/bicer/news.aspx?news_sn=1715&pages=2；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8477。
9. 參見 2008 年 1 月 23 日聯合報〈中英翻譯能力考試 4 科全能僅 7 人〉，2009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107801。
10. 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考試分兩階段考試，通過第一階段聽寫摘要考試後，第二階段為短逐步及長逐步雙向口譯考試，而兩所聯合專業考試的考生則需通過雙向逐步口譯及同步口譯考試方能取得專業證書。
11. Tseng (1992, pp. 133-134) 在其文中雖有提及 PCOs 可能具有的影響力，但當時其結論認定其本身尚未形成一個專業，故對口譯的專業化影響有限。
12. 根據新聞局 2004 年公布的《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接受該調查訪問的 38 位自由口譯員中僅有 3 位未與中介機構合作 (2004, 頁 4-27)。而 Ozolins (2007) 則指出社區口譯員透過中介機構獲得工作機會的比例逐漸升高，故後者對社區口譯專業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13. 這裡的取而代之，指的不僅是兩所聯合舉辦專業考試，也包括在教育部舉辦中英翻譯能力考試之前，委託相關系所或教師參與和考試有關的研究計畫，或是延攬這些系所與教師參與實際試務工作等。
14.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 (2004, 頁 8-27)《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引用 ATA 於 2003 年所作國際認證研究，各國翻譯認證制度下的主辦機構其實可以是政府、民間專業團體、學術機構，乃至其中兩方或三方合作主辦。

感謝詞

作者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

參考文獻

- 行政院新聞局 (2004)。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臺北：作者。
- 洪瑞恬 (2004)。口譯之專業化發展與職業聲望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2005)。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服務建議書。臺北：國立編譯館。
- 廖柏森 (2007)。臺灣口譯研究現況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10，189-217。
- 臺灣翻譯學學會 (無日期)。About us。2009年4月12日，取自http://tati.org.tw/?page_id=2
-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n.d.). *About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TA)*. Retrieved April 12, 2009, from <http://www.atanet.org/aboutus/index.php>
- Birkett, W. P., & Evans, E. (2005). Theoriz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 model for orga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ies of the professionalizing activities of occupational associations of accountants. *Accounting History*, 10, 99-127.
- Child, J., & Fulk, J. (1982). Maintenance of occupational control. *Work and Occupations*, 9(2), 155-192.
- Cullen, J. (1985).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occupational earnings. *Work and Occupations*, 12(3), 351-372.
- Gile, D. (2008, May). *BTIs and MTIs in China: A golden opportunity*. Speech given at the 7th National Conference &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terpreting, Guang Zhou, China.
- Hodson, R., & Sullivan, T. (1990).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n.d.). *Introducing AIIC*. Retrieved April 10, 2009, from <http://www.aiic.net/ViewPage.cfm/article8>
- Larson, M.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cdonald, K. (1995).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London: Sage.
- Mikkelsen, H. (1996).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 M. Jerome-O'Keeffe (Ed.), *Global vision: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pp. 77-89). Virginia: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 Ozolins, U. (2000). Communication needs and interpreting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rum of response. In R. Roberts, S. Carr, D. Abraham, & A. Dufour (Eds.), *The Critical Link 2: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pp. 21-33).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Ozolins, U. (2007). The interpreter's 'third client'. In C. Wadensjo, B. Dimitrova, & A. Nilsson (Eds.), *The Critical Link 4: Professionalis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pp. 121-13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Po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NY: Routledge.
- Tseng, J. (1992). *Interpreting as an emerging profession in Taiwan- a sociological model*.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 Wadensjo, C., Dimitrova, B., & Nilsson, A. (Eds.). (2007). *The Critical Link 4: Professionalis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